

跨文化传播译丛

Angela M. Crack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s



全球传播 与跨国公共空间

[英] 安吉拉·克拉克 著
金然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Angela M. Crack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s

全球传播 与跨国公共空间

[英] 安吉拉·克拉克 著
金 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传播与跨国公共空间 / (英) 克拉克著; 金然译.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7

书名原文: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s

ISBN 978-7-308-14623-4

I. ①全… II. ①克… ②金… III. ①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研究 IV. ①G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3803号

全球传播与跨国公共空间
[英] 安吉拉·克拉克 著 金然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周元君
营销编辑 李录遥
装帧设计 卿松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8千
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623-4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献给我的家人。

总序

1648年以前的世界，不过是一个个隔离的孤岛，虽然出现过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及中国等四大古代文明体系，但这几大文明基本上只有地域性影响力，全球性秩序还没有成为表征那个时代的重要概念。欧洲30年战争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王权和神权的边界确定下来，承认国家主权不可随意被剥夺，欧洲文明开始了全球性扩张，主权国家的概念也影响到世界格局的确立，全球性秩序逐渐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近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文明主导着世界秩序。不过海湾战争后，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结束变成了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这个阶段世界秩序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那就是人权、民主等普世原则等成为超越主权的新的游戏规则，成为美国强势在全球施展影响力的主要工具。当然，最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动作多少从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美国近几年单方面行动的作为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尽管第68届联合国大会2014年3月27日投票通过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决议，申明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同时敦促各方通过直接政治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但俄罗斯置联合国决议不顾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决议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所不同：前者具有政治影响力，但没有法律约束力；后者具有强制性，相关国家必须接受并履行。

尽管金砖国家在迅速崛起，但当今的世界格局，仍然是美国一家独大。美国除了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强势影响外，美国还借助其先进的传播交流技术（尤其是交通与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主宰着全球的经济、

消费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美国主导的经济、文化与政治游戏规则成为这个世界的不二法则。

网络社会的兴起、跨境物质的流动、全球各地区间人类生活方式的互相连接使得“社会”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符号和人都很复杂、易变，产生了一种由“社会化”到“信息”“传播”的转变。^[1]安娜贝拉·斯瑞伯尼（Annabelle Sreberny, 2000）曾指出，“当代修辞学主张，我们生活在一个单一的世界里，在其中，事件与空间均已消亡，距离的体验已不复存在”^[2]。诚然，随着海底电缆、卫星电视、移动电话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国际电信使得时空逐渐消亡，让全世界的人际关系获得自身的即刻性和内在性。全球信息传播重新界定了全球和地方的物理界限，厘定了时间的线性进程，这些都不再虚幻。^[3]

新兴的媒介技术和通信手段，尤其是因特网，让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重构时间与空间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现象。麦克卢汉一样观察到，空间消亡而时间成为关注的焦点是电子时代的决定性结果。但事实上，传播权力并没有因为传媒技术的进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少学者的研究便表明，全球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在线信息往往以欧美国家为中心，国家信息流，仍然是从发达国家流向非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生产的文化产品、娱乐产品，仍然主导着全球文化消费市场。但正因为美国的强势地位，让许多人开始反思“西方是最好的”这一观点存在的问题，包括法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更包括中国、俄罗斯、印

[1] Lash, S., Urry J., *Economies of Sign and Space*, London:Sage,1994; Castells, Mann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1996.

[2] Sreberny, Annabelle,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ition (93-119) . London: Arnold,2000.

[3] Appadurai, A.,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Bass, A.,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J. Derrida.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ix-x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度、南非等金砖大国，重新评估自己传统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一股去西方化、“脱美”的风潮正席卷全球，“欧洲中心论”、“冲击—反应”、“传统与现代”等传统模式无一不再受到更广泛、更严厉的挑战。

与世界权力格局向东转移的同时，重建国际信息新秩序也成为自醒自觉民族和国家的普遍认同。问题是，世界权力的转移是否会导致新的国际冲突？世界和平的理想，是否能够从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文明中获得新的营养？未来的国家实力，如何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找到一种良性的平衡？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真的是世界潜在的规律？

笔者认为，影响世界和平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源稀缺所导致的利益之争，但与此同时，那种“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之类的二元思考框架，也影响着人们无法超越自我格局的思维定式。这种“你们”与“我们”、“西方”与“东方”的区隔，不仅表现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之中，也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等方面。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布热津斯基的“全球权力危机论”、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到保罗·肯尼迪的“美国的衰落论”，都能够发现“西方”与“非西方”、“我们”与“他们”的实质性区别。诚如保罗·柯文所言：“美国人在处于逆境时，依然可能在感情的最深处不由自主地回到那种经过夸大的‘我们’与‘他们’的两分法思想中去，认为‘我们’代表‘文明’，‘他们’则代表文明的对立面。”^[1]这种思维定式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式，

[1] [美] 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59 页。

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1]

历史上从来不乏智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芝加哥大学的谢尔登·波拉克 (Sheldon Pollock) 教授曾出版过一本专门论述世界主义精神的著作，名叫《世界主义》。在该书中，他专门讨论了印度的世界主义精神，以及这种精神与欧洲历史上出现的世界主义精神之间的差异。与世界主义对等的概念——“天下”，同样见之于中华文明。它的确隐含了“世界主义”的含义。“天下主义”与西方的“世界主义”尽管存在差异，但它仍可以看作是古希腊“世界主义”的对应词 (杰拉德·德兰迪、郭忠华，2011)。^[2] 在西方，随着希腊城邦扩张到波斯，然后又到印度，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思想便自然而然萌生了。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声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第一次清楚地表达出世界主义最初的理念之一就是追求个人自由。而智者学派的安提丰 (Antiphon) 的雅典思想家就“以毫不含糊的词语断言，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并谴责贵贱之分和希腊人野蛮人之分”，他的见解“表述了一种坚定的世界主义”。^[3] 之后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普世观念，反映了人类成员间亲密而安全的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一种个人的自由行为。斯多葛派批评了古希腊人思想中将政治团体局限于城邦的倾向。芝诺 (Zeno) 认为，一个理想的世界城市应建立在一个囊括更广泛的人类社会成员的基础之上，他强调政治责任来源于强烈的主观情感。公民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即国家应当是一个世界国家的想法，形成了罗马人和基督教思想的世界普救说的基本观点，给当代社会展现了一种超越我们现在所属社会的人类社会的景象。

1772 年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他的《关于波兰政府的思

[1] 吴飞：“与他人共在：超越‘我们’/‘你们’的二元思维”，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 年第 10 期。

[2] [英]杰拉德·德兰迪、郭忠华：“‘世界主义’共同体如何形成——关于重大社会变迁问题的对话”，载《学术月刊》2011 年第 7 期。

[3] [德]E.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7 页。

考》一书中，预见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再没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国人之分，而只有一种人的存在——欧洲人。他们有共同的品位、一样的激情以及相同的生活方式。1784年康德发表了《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宣称历史正在趋向于缔造一个世界主义共和政体的秩序，而这一秩序将取代由民族共和国组成的世界。1795年9月29日71岁的康德写下了著名的《永久和平论》一文^[1]，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法律层面上的世界主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世界主义宪法），开创了世界主义政治哲学，再次将世界主义推到学术前台。不过，尽管世界主义的思想无论在自由主义者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可以找到知音，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却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冷战之后，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和移民运动，以及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公民社会的壮大和全球治理的发展，世界主义的理念也得到广泛的复兴和发展。人们发现，国家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行动者，尽管它仍然是最重要的行动者。相反，在处理全球公民社会的事务中，国家已越来越力不从心，各种跨国组织和国际协议（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APEC、G20、奥委会、绿色和平组织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恐怖分子、买卖武器者、洗钱者、贩毒者、拐卖妇女儿童者和知识产权的现代抢夺者都是通过全球网络运作的。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官员——警方调查员、金融监管者，甚至法官和立法者——越来越在全球范围的网络上交换信息和协调行动以打击全球犯罪，解决共同的难题。^[3] 尽管正在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是否能组成一个世界之城仍不确定，

[1]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7—144页。

[2] 参见[英]罗兰·罗伯逊、[英]扬·阿特·肖尔特、王宁等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3] [美]斯劳特：《世界新秩序》，任晓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但它的确为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

当然“世界主义”不过是众多关于国际新秩序思考的一种向度，其他诸如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文明冲突论、天下体系、依附理论、文化帝国主义、软实力论等，都各领风骚，在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近几年中国一直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其基本内容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这种新秩序的建立，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总之，进入 21 世纪以来，地球虽然还是那个世界地球，但全球秩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新媒体技术、软实力、符号资本等成为传播学研究者最为关切的核心概念。而随着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巨大发展，GDP 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作为世界重要成员的国家身份认同变得异常强烈，中国领导人顺势提出了中国梦旗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重构自己大国形象并谋求在世界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因此重构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国家形象就变成当下最热闹的研究课题。但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如何清晰地表达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同时又如何向国人说明“中国梦”以求形成整合力量，仍然是相当复杂而艰难的工作。

为此，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组织翻译了这套丛书。这些著作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全球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中国学界、政界，甚至是商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丛书的译者，大多有较长时间的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学习经历，数位译者在海外工作，这确保了翻译的质量有一定的保证。浙江大学出版社有一支

优秀的出版编辑队伍，他们辛苦的劳动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特此致谢！

吴 飞

2014年3月28日

致 谢

这本书由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发展而来 (Crack, 2004)。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安东尼·麦克格鲁教授，没有他无条件的支持和珍贵的指导，我不可能完成博士论文，也不可能写成这本书。还要感谢答辩委员会成员托尼·埃文斯博士和巴里·艾克斯福德教授，他们为我提供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尤其感谢艾克斯福德教授，在我答辩完成之后他一直对我的研究保持非常大的兴趣。

本书所展现的理念深受尤尔根·哈贝马斯、南希·弗雷泽和詹姆斯·伯曼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著作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启迪。多年以来，同行们对我的思想的诸多独具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也让我深深受益。非常感激大卫·欧文博士，他审阅了我的草稿。也感谢所有参加坎伯兰小屋会议的学者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感谢已故的阿兰·格兰特友好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民主政治研究中心介绍学术成果。同时也非常感谢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皮特·伍德考克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他的盛情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该校各种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并参与讨论，在这些研讨会上收获的反馈意见让我受益匪浅。

非常感谢我的同事麦克·曼宁，他在临近截稿时帮我分担了许多工作。尼克拉·罗南的慷慨帮助让我顺利完成了索引部分。我还要把诚挚的谢意献给飞利浦·赛伯教授——他对本书的出版一直抱有极大的信心，以及托尼·华尔和凯特·安可夫斯基——他们在排版方面给予耐心帮助。我深深地敬佩玛冉和所有帕尔格雷大麦克米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来自某位匿名评论者的宝贵意见。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家人、朋友和同事为我源源不断提供的精神支持。他们忍受了我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的多次悲叹，并一直用通情达理的态度面对我的坏情绪。让我们欢呼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吧！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s

by Angela M. Crack.

Copyright © Angela M. Crack, 2008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s* by Angela Crack.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er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第一章 将跨国公共领域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理论 ·····	1
第一节 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基础·····	4
第二节 国际关系学的后实证主义理论·····	10
第三节 本书主要论点概述·····	18
第二章 重新构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 ·····	25
第一节 哈贝马斯和公共领域理论·····	27
第二节 哈贝马斯的近期著作·····	44
第三节 从另一个角度看全球公民社会理论·····	48
第四节 总结·····	51
第三章 跨国公共领域理论争鸣：建议采用替代性分析框架 ·····	53
第一节 域外公共领域：文献综述·····	54
第二节 新兴跨国公共领域的先决条件·····	73
第三节 小结·····	76
第四章 信息时代：跨国界传播能力 ·····	77
第一节 “信息时代”·····	78
第二节 网络革命·····	85

第三节	信息时代的差异和不平等·····	99
第四节	总结·····	113
第五章	全球治理的兴起：政治权威场所的变革·····	115
第一节	定义全球化·····	116
第二节	国家自主性、国家治理和国家认同的变革·····	122
第三节	对政治权威的重新思考·····	143
第四节	总结·····	148
第六章	全球公民社会：拥有相互间亲和力的跨国网络·····	151
第一节	公共领域理论的相对优点·····	153
第二节	“虚拟社群”的理论推定·····	155
第三节	论跨国网络中相互间亲和力的标准·····	160
第四节	国际妇女运动·····	165
第五节	萨帕塔运动·····	178
第六节	“绿色和平”运动·····	188
第七节	小结·····	200
第七章	总结·····	206
第一节	主要观点回顾·····	207
第二节	跨国公共领域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	215
索 引	·····	220

第一章

将跨国公共领域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理论^[1]

全球化是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它可以增强统治，也可以加速解放。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正在快速地将物质财产聚集到跨国精英们的手中，其重要表现是全球财富的悬殊化分配。遍布世界各地的富豪和五花八门的跨国集团，牢牢掌握着构建当今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的结构性权力核心。赫尔曼（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sky）在1988年就指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霸权主义是靠全球各大媒体巨头所“炮制的媒介内容”来支持的。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全球化的进程可以拓宽国家间对话的渠道，鼓励跨文化交流，推动基层和弱势阶层的政治参与，因此也形成了抵抗霸权主义的力量。有不少学者指出（例如Held, 2003），媒体和移民潮正在削弱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民众政治理念中的作用，而一种全新的世界主义精神正在兴起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不断兴起的国际公民社会运动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例如反企业运动以及“让贫困成为历史”运动。因此，我们可以将全球化管理为一个二元对立体系，它是由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所产生的不断变化的矛盾统一体和其发展过程。

这些不同的趋势中贯穿着一个统一的主题：信息及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简称ICT）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和货

[1] 本章论文的另一版本已经发表在期刊 *Globalizations* 上 (Crack, 2007)。——作者注

本书全书注释除特殊标明的作者注释之外，其余皆为译者金然女士所作的译者注，特此向金然女士表示感谢。——编者注